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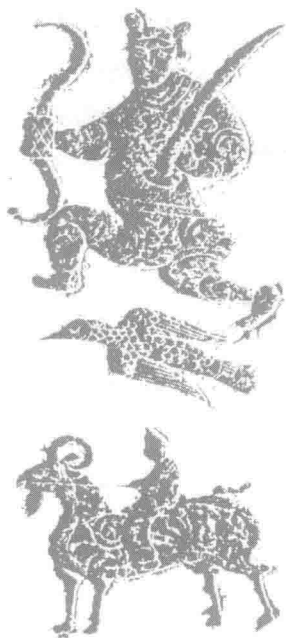
『十三五』江苏省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 方位模式研究

王倩 著

资助出版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ZW024）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七批特别资助（2014T7044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二等资助（2013M540400）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项目（1301017C）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研究 / 王倩著. — 镇江 :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684-1036-6

I. ①汉… II. ①王… III. ①画像石—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K87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0582 号

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研究

Han Huaxiangshi Xiwangmu Tuxiang Fangwei Moshi Yanjiu

著 者/王 倩

责任编辑/杨海濒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市江东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21.75

字 数/402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1036-6

定 价/7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前 言

在汉代神话与宗教信仰中，西王母作为一位极其重要的女神，频繁出现于汉画像石中，而且与这位女神一起出现的还有东王公、伏羲、女娲、昆仑山、扶桑树、玉兔、羽人、九尾狐、青龙、白虎等神话形象。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形象多数位于画像石的右边，象征与代表的方位是西方。换言之，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是左东右西，这与现代地图学所规定的左西右东的方位理念完全相反。由此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汉画像石中会出现左东右西的方位模式？该问题的探讨涉及如下几个方面：一、如何看待汉画像石的性质与功能？二、如何界定汉画像石方位划分的参照物？三、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方位模式是否为汉代神话表述的方位模式的典型模式？四、汉画像石中西王母图像所反映的方位模式与世界其他文化类型的神话宇宙论是否一致？五、汉画像石方位模式与世界其他文化类型的神话方位模式的异同有哪些？六、造成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地理学意义上的方位通常指的是方向与位置，具体说来就是上下、左右、中心；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左方、右方。在此方位理念基础上，笔者将上述6个问题的探讨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一）汉画像阐释的规约问题

笔者在理论上提出一个具有建构意义的问题是：汉画像石阐释的原则是什么？笔者认为，在阐释汉画像石图像意义时，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成语境中加以考察，此种原则被称为情境性原则。所谓情境性原则，指的是在使用相关证据阐释问题，尤其是在使用物与图像阐释问题时，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成的文化语境中加以探讨，其中包括物与图像所属的文化类型，其在出土遗址中的位置，所在的整体性物理性位置，以及所属的文化与历史时空范畴等。情境性原则的提出，避免了比较研究中将问题与现象简单归类与并置的现象，从而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性的阐释规约。

（二）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的基本特征

汉画像为汉代丧葬艺术，与汉代神话、宗教、民间信仰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其生成时间要远远早于现代地图学出现的时间。因此，在界定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时，不能以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地图学方位划分的原则，即地图的观察者作为划分方位的参照物，将左西右东视为方位结构。基于情境性原则，在划分西王母方位模式时，应遵循作为历史时期的汉代文化规约进行阐释。汉代文献、仪式、出土实物，以及相关的口传与民俗学资料表明，汉代文化划分方位时，将实物自身而不是观察者作为划分方位的参照物。因此，在划分汉画像石方位时，将画像石自身作为划分方位的参照物，由此得出左东右西的水平方位模式。

（三）汉画像石图像水平方位模式

西王母图像所反映的水平方位模式是否具有普适性？笔者将此问题置于汉代画像石体系之内，探讨汉画像石水平方位模式。笔者深度分析与考察的结果是，在汉代神话与宗教信仰中，西王母所在的昆仑山不死世界是亡灵最后的归宿。汉代亡灵从死后到昆仑山的途径是车马出行，即亡灵借助于车马而升天。因此，在汉代画像石中，几乎所有的车马出行都向着画面右方，即面向西方而前行。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安徽褚兰汉墓出土车马出行图。褚兰汉墓出土车马出行图所表现的宇宙是二分世界，与此对应的是此世与彼世，即生前与死后世界。人死后亡灵借助于车马西行而升天，这就意味着亡灵通过水平方位的转换而抵达垂直方位。此种理念乃是中国本土神话与信仰的产物，并非为佛教思想影响所导致。

（四）汉画像石图像垂直方位模式

汉画像石描述的相关图像场景，诸如铺首衔环、神树、玉璧等图像场景表明，除了车马之外，人死后亡灵还借助神树、玉璧等相关物品抵达西王母所在的不死乐园。由此，玉璧、神树、玉兔、九尾狐等神话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天界的象征符号。在汉画像石表述的垂直世界里，死者的亡灵归宿是图像表述的核心，所有一切图像表述皆围绕死者升天而进行，天界的相关神明，诸如西王母、伏羲、女娲、天帝、雷神、水神等相关神明，皆为表述亡灵的最终归宿而存在。天界的所有图像与象征性符号，都是为死者亡灵升天而被表述的。这种将天界及其表现符号功能化的做法只有一个功能，即将死者亡灵送到西方不死乐园。

（五）汉代神话文本方位模式

汉代神话文本，尤其是《淮南子》《山海经》《吕氏春秋》所表明的方位

理念表明，汉代方位模式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动态、开放的，它与五行、意识形态，乃至王权的建构密切相关。这种方位模式是动态关联的神话政治方位模式，它通过方位空间之内事物的互相关联与归类，将事物的属性与政治空间、宇宙方位关联起来。

（六）希伯来神话方位模式

较之于汉画像石方位模式，希伯来神话文本《圣经·旧约》所反映的方位模式具有明显的功能化特征，即宇宙没有具体的形状，而只有特定的功能与用途。《圣经·旧约》表述的宇宙没有中心，只有东西南北4个方位；上下垂直方位沟通的途径除了先知之外，还包括异象、石头与树。东西南北4个方位可以划分为东方与西方这两个具有明显二元对立意味的方位范畴，前者与炎热、正面意义相关，后者则与寒冷、负面意义相关。

（七）希腊神话方位模式

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的方位模式则表明，水平方位尤其是东方，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味，东方某种程度上具有明显的地域想象色彩，右方是神圣的方位，也是神明与人类沟通的方位，左方是不祥的方位，充满了危险与不安的因素。位于东方的亚洲与北非地区为充满危险与邪恶意味的野蛮之地，而位于世界中心的希腊本土城邦则是文明与安全的象征符号。这种方位模式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意味，本质上为我族中心主义的方位理念，充满了浓郁的意识形态意味。这是一种希腊式的方位模式，异域文明一定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与乌托邦化，是对希腊本土文化与文明的自我关照与认同。

通过以上比较与分析可知，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更多地与汉代神话、宗教与民间信仰相关。此种方法模式将神话世界的昆仑山作为世界中心，也是上下沟通的桥梁与通道，亦将其视为亡灵最后的归宿。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理念是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对于西域世界的一种乌托邦化想象，也是历史时期的汉帝国对于作为异域的西方世界的征服与向往的图像志表述。

目 录

导 论

第一节 英语学界西王母研究综述·····	001
一、西王母身份演变·····	002
二、西王母图像结构·····	005
三、西王母与外部世界·····	009
四、结 语·····	013
第二节 国内学界西王母研究综述·····	013
第三节 研究思路·····	016

第一部分 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

第一章 西王母图像方位参照物·····	021
第一节 引 言·····	021
第二节 汉画像石方位划分参照物·····	022
第三节 汉代仪式方位划分参照物·····	027
第四节 结 语·····	030
第二章 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	031
第一节 引 言·····	031
第二节 西王母图像方位特征·····	032
第三节 西王母方位模式的源头·····	037

第二部分 汉画像石水平方位模式

第三章 褚兰汉墓车马出行图方位模式·····	045
第一节 引 言·····	045

第二节	车马升天	046
第三节	车马尚右	051
第四节	西上升天	053
第五节	结 语	059
第四章	汉画像石铺首衔环方位模式	060
第一节	铺首衔环阐释的误区	060
第二节	铺首衔环构图特征	061
第三节	铺首衔环图像志描述	065
第四节	铺首衔环图像的功能	071
第五章	萧县汉墓连壁纹方位结构	076
第一节	连壁纹图像情境	076
第二节	连壁纹象征意义	078
第三节	连壁纹神话源头	084
第四节	结 语	087

第三部分 汉画像石垂直方位模式

第六章	石椁墓神树图像方位结构	091
第一节	树形符号的图像结构	091
第二节	作为天梯的神树	096
第三节	圣树图像的史前原型	102
第四节	结 语	103
第七章	陕北汉圣树图像方位模式	105
第一节	圣树图像的构图特征	105
第二节	圣树图像的宇宙模式	109
第三节	圣树图像的原型	114
第四节	结 语	117

第四部分 汉代文本神话方位模式

第八章	文本神话《淮南子》方位结构	121
第一节	研究综述	121
第二节	五方关联	122

第三节 五方均质	128
第四节 五方叙事的政治意图	132
第五节 结 语	137

第五部分 地中海世界神话方位模式

第九章 《圣经·旧约》方位结构	141
第一节 功能化的宇宙论	141
第二节 四方概念	146
第三节 作为交流媒质的石头与树	152
第四节 结 语	159
第十章 希腊神话的方位模式	160
第一节 荷马史诗的“东方”	160
一、荷马的“东方”范畴	160
二、荷马“东方”世界的建构因素	162
三、荷马“东方”形象的生成语境	165
四、结 语	168
第二节 荷马史诗的方位结构	169
一、荷马史诗的宇宙结构	169
二、地理方位模式	173
三、左方与右方	176
四、结 语	179
第三节 希腊游历神话的方位	180
一、叙述主角的身份	180
二、神话的叙述方位	182
三、游历神话的叙述方位	185
四、结 语	187
参考文献	189
一、中文专著	189
二、中文译著	191
三、英文专著	194
四、英文论文	199
五、中文论文	201

图 录	205
附 录：汉画像石神话谱系	208
附录一：汉画像石神话形象谱系（田桂丞整理）	209
一、神话形象分类	209
二、汉画像石神话形象谱系特征（田桂丞）	315
附录二：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神话形象谱系地域特征	317
一、相关数据	317
二、神话形象地域特征	318
三、神明职能	321
四、结 语	324
附录三：山东（部分）汉画像石神话形象谱系的地域特征	325
一、引 言	325
二、汉画像石神话形象分类与统计	325
三、结 语	334
后 记	336

导 论

第一节 英语学界西王母研究综述

作为中国神话体系中一位重要的女神形象，西王母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探讨话题之一。对于英语学界的学者而言，西王母更多地与神话、道教相关，西王母研究因此成为中国本土神话与宗教研究，乃至汉学研究（Sinology）的一个组成部分。英语学界关于西王母的研究始于1942年，^①迄今已有70余年历史。以西王母为主题的相关论著与论文近百部（篇），相关探讨领域已经涵盖文学、文化、政治、历史、宗教、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阐释方法几乎包括各个学科：文学、史学、考古学、艺术学、宗教学、人类学，等等。某种程度上讲，西王母研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学形象研究问题，它几乎涉及当下学术探讨的每一个热点问题：特定时期历史的书写方式，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关联，图像与意识形态的建构，政治与文学表述，宗教信仰与文化表述之间的冲突，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英语学界的西王母研究反映了西方学者，尤其是英语学界的学者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认知态度。基于此，本书拟对英语学界关于西王母之探讨作系统分析与阐释。

本书从方法论创新层面分析英语学界的西王母研究，重点分析研究者在阐释理论与方法方面的创新，同时兼顾问题意识。笔者将文中相关问题的讨论置于其生成情境中，以此反观研究者的认知态度。另外，本书的研究范围限于英

^① 英语学界关于西王母的专题研究始于学者德效骞（Homer H Dubs）。1942年，德效骞在《哈佛神学评论》发表《中国古代秘仪》一文，该论文从题目看上去并非是以西王母为研究对象，实际上德效骞却将西王母祭礼作为古代中国秘仪的代表，全文探讨的对象只有西王母而未论及其他神明。德效骞关于西王母的探讨，读者可参见 Homer Dubs, *An Ancient Chinese Mystery Cult*.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942, 35(4).

语学界，即所选研究对象以英语为书写语言，以国外英文学术期刊或著作为载体，其中包括英文期刊学术论文，硕士、博士论文，英文专著，但并不包括英文书评。笔者以时间为顺序，以方法论为基础，以问题意识为线索，在此原则下逐一分析，凡涉及研究者皆为在方法论层面有所创新者，并不考虑其他因素，诸如研究者的学术名望、学术地位与学术影响，研究者的年龄与性别，等等。

一、西王母身份演变

就学科归宿而言，英语学界的西王母研究属于汉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采用的阐释理论、方法与模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英语学界汉学研究的影响。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英语学界的汉学研究带有既定的意识形态意图，即学者们将中国及其文明视为有别于自身文明的“他者”。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汉学研究者会将带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化与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由此可以看到，自19世纪初叶至20世纪上半叶，法国与英国的汉学研究出现以翻译与介绍中国古典典籍为主流的范式，它甚至成为20世纪中叶之后美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路径之一。尽管学者们面对的研究对象各有不同，但此时的汉学研究主要以实证主义为主，即通过大量元典的考证而完成阐释工作。法国与英国倡导的此种汉学研究模式曾一度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主流，对于美国的汉学研究具有塑造性作用，其影响一直到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二战之前的美国汉学研究几乎是欧洲汉学研究的翻版，不论是研究对象还是阐释方式均如此。换言之，美国汉学研究者依然会选择中国文化要素中具有本土特征的部分加以研究，继而发现中国文化不同于美国文化的特征，以此反观美国文化。在这种思维模式导引下，从事宗教研究的美国汉学家自然会将其目光转向道教，尤其是作为道教女神的西王母形象。因此，当人们发现美国汉学家德效骞在1942年将西王母作为其研究对象时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在德效骞所处的时代，欧洲汉学界还未有人关注过道教，尤其是道教女神西王母形象。^① 德效骞在这篇名为《中国古代秘仪》的文章中指出，在古代中国，作为女神的西王母形象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与此相反的是，她是不断变化身份的女神：“在前汉时期，西王母是民间宗教中的女神形象，她住在遥远西方的高山之上，若有人违背天意，她便从高山之上降下灾难以示惩罚。西王母看上去是极为古老的女神，或许极有可能她从史前时期就作为凶神而存在。因中国古代

① [法] 保罗·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秦时月译，《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2期。

神话对其名字加以改造，西王母成为一位对人类存有怜悯之情的女神，赐给其信徒以长生不老之身。公元前3年有一场大旱，西王母信仰就此落地开花，成为一种全民皆信的迷狂性救世信仰，传遍中国四方。……我们并不知晓此种信仰的后续性历史，它极有可能进入了道教的西王母信仰。”^①这实际上是对西王母形象演变的一种考察，似乎毫无新意，一旦将其置于其生成语境中，人们便会发现其价值所在。

德效骞在辨别西王母身份时，主要采用了文字资料而不是图像或其他材料。在文献的种类上，德效骞使用了24种文献来阐释西王母形象，其中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楚辞》《竹书纪年》这类神话文本，此外还涉及《汉书》《礼记》《尔雅》这类非神话文本。更为重要的是，德效骞使用的文献皆为中国古代文献元典，而不是译自中文的英文资料。甚至，他使用了商代的甲骨文来阐释西王母形象，认为甲骨文的“西母”就是西王母。^②这种依靠中国古代文献的阐释方式并不是当时美国汉学研究的主流，因为当时多数学者依靠的资料是英译的中国文献而不是中国古典文献元典。自19世纪以来，欧洲汉学研究便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经验主义的阐释模式，另一种是本土主义阐释模式。经验主义的阐释模式主要依靠中国古典文献来研究中国，而本土主义阐释模式则依靠英译的中国文献进行研究，它在19世纪中叶之后成为欧美汉学研究的主流。^③在此种学术环境中，德效骞使用中国古典文献取得的阐释效果自然就更具说服力，亦极为难得。但因其所处学术时代的原因，德效骞并未使用图像资料，尽管他使用了甲骨文资料，但德效骞将甲骨文视为文献而加以使用。因此，从证据的有效性来看，德效骞关于西王母形象的阐释并不具备十足的说服力，因为他并未涉及图像尤其是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图像。

自德效骞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西王母研究依然以文本为主，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汉学家里尔卡多·弗拉索尔（Ricardo Fracasso）依然采用文本阐释的方法探讨西王母形象的演变。他指出，西王母形象并非像德效骞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身份，实际上其身份经历了3次变化：在战国之前，西王母是一位凶神，后来此种凶神的形象被逐渐改造，到了东汉逐渐成为一位道教女神，东汉之后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形象再次发生变化，成为西方昆

① Homer H. Dubs. An Ancient Chinese Mystery Cult.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942, 35 (4).

② 同①。

③ Jennifer L. Hargrave. Marco Polo and the Emergence of British Sinology.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2016, 56 (3).

仑山乐园的不死女神。^① 尽管里尔卡多·弗拉索尔尽力使用各种文本材料阐释其观点,但在方法论与材料的处理上,他并未有任何新创见。因为他使用的材料依然局限于文字材料,在文献的数量上,里尔卡多·弗拉索尔并未超越德效骞使用的 24 种文献材料,他使用的描述西王母身份的材料只有 17 种。看上去就是,单纯依靠文本来探索西王母形象演变与发展的阐释模式似乎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瓶颈。事实上,学术研究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源自阐释材料,尽管人们不得不承认理论与方法创新并非如此。

某种程度上说,西王母形象研究的进展与中国考古学界的发掘密切相关,当考古文物愈来愈丰富时,关于西王母图像的研究成果愈丰硕,事实上这也是学术界常见的现象与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在全国各地发掘出数量可观的汉画像石墓葬,同时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西王母图像,这就给西王母身份的研究带来了新契机。较之于英语学界早期单纯依靠文献界定西王母身份的研究,后期的研究者多半利用文献与图像资料两种证据进行阐释,借助于新出土的图像资料,西王母身份研究有了新进展。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数量众多有关西王母的考古文物,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英语学界关于西王母身份的图像研究才有新发现。^② 原因比较复杂,因不属于本文重点阐释内容,此处省略。早在 1983 年,简·詹姆斯(Jean M. James)在其博士论文中就已经指出,多数人认为西王母是统治西方昆仑山的不死女神,但直到东汉时期,墓葬中才出现西王母图像,她这个时候才成为昆仑山的统治者。^③ 1995 年,简·詹姆斯再次指出,“我们发现,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同那些文献对她的描述并不完全一致。”^④ 具体到汉画像中,

① Ricardo Fracasso. *Holy Mothers of Ancient China: A New Approach to the His-Wang-mu* 西王母 Problem.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Livr. 1/3, 1988, 74.

② 早期的学者首先关注的是西王母图像的艺术性问题。比如,法国学者时学颜(Hsio-Yen Shih)的博士论文《古代汉画像艺术风格》(1961 年)就探讨了山东嘉祥汉画像石与西王母图像的艺术特征。还有的学者将阐释核心放在西王母图像意义的探寻上,比如,白瑞霞(Patricia Ann Berger)在其博士论文《汉代中国东部画像艺术中的祭礼与庆典:以山东与江苏省为例》(1980 年)中强调了西王母图像的程序问题。上述研究具体参见 Hsio-Yen Shih.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Style: From the Later Han to the Six Dynasties*. PH. D. Dissertation, Bryn Mawr College. 1961; Patricia Ann Berger. *Rites and Festivities in the Art of Eastern Han China: Shantung and Kiangsu Province*.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0.

③ Jean M James. *An Iconographical Study of Two Late Han Funerary Monuments: The Offering Shrines of the Wu Family and the Multichamber Tomb at Holtingor*.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0: 57.

④ Jean M James. *An Iconographic Study of Xiwangmu during the Han Dynasty*. *Artibus Asiae*, 1995, 55 (1/2).

就表现为以下几种差异：山东画像石中的西王母是西方昆仑世界一位仁慈的女神，同时还是“阴”性力量的象征性符号，而四川、徐州与陕北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形象则仅是一位统治昆仑世界的女神，其图像没有任何象征意义。因此，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并非是道教的西王母，她首先是作为西方昆仑世界的不死女神而存在，其次才是阴性力量的象征符号。简·詹姆斯强调，“尽管存在着宇宙论，但西王母从来都没有失去最初作为人间神的角色，因为她原本是人们崇拜的一位慈悲女神，她赐予祈求者财富与长寿，并让其灵魂得以重生。”只不过，詹姆斯的这些阐释注重的是西王母图像的构图模式，并未涉及西王母图像之外的文化与宗教语境。

英语学界关于西王母图像研究开启了探寻西王母身份的热潮，尤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与此同时，西王母身份的考证问题被其他相关问题所代替，比如，西王母图像的建构问题、西王母图像的象征意义，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上述问题的探讨往往伴随着方法论的创新，这是西王母图像阐释的重要特征。

二、西王母图像结构

客观上讲，英语学界关于西王母图像研究的理论直接源自结构主义神话学，而不是汉学。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西王母是神话形象，而不是政治与历史形象，因此，当学者们试图阐释图像中的西王母形象时，他们更多地借鉴了结构主义神话学的理论与方法。结构主义神话学有 3 个核心概念，按照先后顺序，它们分别是关系、转换、文本。对于结构主义神话学者而言，神话是社会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与文化、政治联系在一起，这些思想形式与行为背后隐藏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它们之间是相互契合的，通过系统分析可以发现其内在联系。因此，关系具有多样性，其中包括神话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有不同神话版本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主义神话学者看来，单独的一则神话没有任何意义，神话的意义就在于它与其他神话之间的关系。尽管神话有不同的版本，在同一种神话结构下，很多神话要素能够相互转换；转换涉及各种不同异文中的神话与另外一些神话之间的转换，以及各神话之间关系的相互转换；文本与关系有关，它强调分析者在分析神话时，要理解独立于神话之外的民族志文本，因为它们组成了当地的文化，涵盖了集体的对象、价值，以及组成文化的各个社会机制。在分析神话时，要对以下要素进行分析：植物、动物、食物、狩猎方式、渔猎技术、天文历法，等等。结构主义者宣称，只有在一个比

较系统的文化结构中分析这些要素之后,才能够全面理解神话。^①

在这样一种认知模式下,当研究者阐释图像中的西王母形象时,他们倾向于首先分析西王母图像的构图要素,然后再考虑其他问题。在利用结构主义神话学阐释模式分析汉代西王母图像方面,鲁惟一(Michael Loewe)堪称代表。鲁惟一在其论著《通往仙境之路:中国人对长生的探寻》中,^②采用了结构主义神话学系统分析与关联阐释的方法,对图像中的西王母形象进行了解读。从证据的类型上看,鲁惟一使用的西王母图像主要源自汉代的铜镜、画像石、画像砖。但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鲁惟一对西王母图像的阐释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关联的。这种图像要素关联的分析方法主要体现在西王母与其相关图像符号的分类上。鲁惟一指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并不是孤立的神话图像,相反,它由众多的神话要素与符号建构而成。这并不是说西王母图像是由众多神话符号组成,而是意味着西王母图像指向了更多与其相关的神话图像。鲁惟一指出,汉代铜镜、汉代墓室壁画、汉画像石、汉画像砖等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可分成10种象征性符号,即胜、龙虎、兔子、蟾蜍、三足乌、武丁、哀求者、九尾狐、六博、宇宙树(柱、山)10种神话形象。仔细考察便会发现,上述10种神话图像均指向了权力、不死与永生。^③这就说明,汉代图像叙事中的西王母实际上是一位掌握不死大权的主神,她在中国宗教信仰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鲁惟一关于汉代图像中的西王母形象研究实际上开启了西王母图像研究的结构主义阐释先河,自此之后,西王母图像研究进入了由图像构

① 结构主义神话学的代表学者主要有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马塞尔·德蒂安(Marcel Detienne)、柯克(G. S. Kirk)。具体论著参见: Claude Lé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Claire Jacobson and Brooke Grundfest Schoepf. London: Penguin, 1972; Claude Lévi-Strauss.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mes Harle Bell, John Richard von Sturmer and Rodney Needham, edit.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9; Claude Lévi-Strauss. *Myth and Meaning*. London: Routledge, 2001; Claude Lévi-Strauss. *From Honey to Ashe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ohn and Doreen Weightman. London: Cape, 1973; *The Jealous Potter*. Translated by Bénédicte Chori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Jean-Pierre Vernant. *Myth and Thought among the Greek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Jean-Pierre Vernant. *Myth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net Lloyd.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79; Marcel Detienne. *The Gardens of Adonis: Spices in Greek Mytholog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net Lloyd. 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1977. G. S. Kirk. *Myth: It's Meaning and Functions in Ancient and other Cult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② Michael Loewe. *Ways to Paradise: 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 London: George & Unwin, 1979.

③ Michael Loewe. *Ways to Paradise: 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 London: George & Unwin, 1979: 103.

图特征到图像深层结构阐释的阶段。从方法论层面来看,鲁惟一的研究工作价值可谓大矣。但人们也同时看到,鲁惟一关于西王母图像的研究是基于类型学基础上进行的,他并未考虑西王母形象在每一种图像中的特殊位置,以及它自身在出土环境中的情境。某种程度上,对其阐释依然属于西王母图像表层结构,并未深入到西王母图像背后的文化与信仰机制层面。

从范畴上讲,阐释就是对事物的理解,有多少种不同的理解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诠释,不同的阐释者对于事物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阐释因而具有任意性与主观性。当论及图像的阐释时,必须将阐释对象视为文化或思想的载体,而不是一种物质性的无意义存在。因此,对图像的阐释是对其文化意义或思想性的一种探寻过程。但意义是具体的,与其生成语境密不可分,这是解读图像意义的基本规约。神话学将这个基本规约命名为“情境性原则”(situational principle),即要求研究者根据当时艺术持有者的眼光来阐释艺术。神话学者艾萨克·科尼利厄斯(Izak Cornelius)指出,情境性原则就是从图像持有者的眼光出发的一种规约,本质上是阐释者代替图像表述其内在意义,尽管有时无法完全还原其意义。^①确切地讲,“情境”这个术语是从情境考古学借用过来的术语,它是考古学者解读器物意义的重要尺度。考古学伊恩·霍德(Ian Hodder)这样定义情境:“每个客体同时存在于多个相关的维度中,因此,一旦数据存在,则一个关联和对比的网络可以用于建立意义的阐释。围绕着任何客体变化的相关维度的总和可以定义为该客体的情境。我们试图赋予意义的客体x的相关情境就是按以上方式形成显著模式的客体x的所有相关资料。考古学意义上对情境的更精确的定义就是‘所有相关环境的总和’,所谓‘相关’指的是客体的显著关系,就是可以用来定义客体的意义的必要关系。我们同时已经发现,情境取决于所问问题的类型。”^②相较于考古学,神话学对图像情境性的规约侧重于文化层面而不是物质层面,情境性因而有着特定的内涵。概括地讲,情境性原则要求神话研究者将艺术置于其生成语境中加以阐释,它大致包括3个层面的内容:其一,图像生成的自然环境。研究者要将图像放到其生成的自然环境之中,这种情境性规约意在了解图像与其生成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联,其中还包括图像及其媒质之间关系的考察。其二,图像的文化空间。阐释

^① Izak Cornelius. *The Many Faces of the Goddess: the Iconography of the Syro-Palestinian Goddesses Anat, Astarte, Qadesheth, and Asherah*, c. 1500-1000 BCE. Fribourg, Switzerland: Academic Press an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4: 7.

^② Ian Hodder. *Reading the Past: 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39.

者在研究图像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图像所属的文化类型和特征，将该文化中与图像主题相关的诸叙述形式纳入考察范畴之内：仪式、口头传统、民俗、民间故事，等等，毕竟这些叙述样态是文化密码的载体，通过这些文化要素的考察，可以了解图像的意义。其三，图像的历史背景。这要求研究者在解读图像意义时，将其置于既定历史范畴内，然后考察图像的时间与空间属性。

从图像阐释的情境性原则来看，巫鸿关于山东武梁祠西王母图像象征意义的探讨不啻为这方面的代表。巫鸿并非职业的考古学者与神话学者，但他强调的“图像位置的意义”这一规约与考古学即神话学倡导的情境性原则非常一致。巫鸿强调，“这里所说的‘位置的意义’是指一个既定情节单元的意义，因为情节单元由其在整个图像中所处的位置来界定其意义。一套画像作品总是包含许多其他的情节单元并与一个仪式性建筑呼应。正如对武梁祠的复原所显示，一个特定图像情节单元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而总是有意识地与其他情节单元相互关联，共同装饰一座墓葬建筑——就像武梁祠这样一个画像设计总是以特定的象征性结构为基础。”^① 基于此种基础上，巫鸿对武梁祠西壁山墙上的西王母图像进行了情境性解读。他指出，“两处画像皆为对称式设计而成，分别将身形硕大的西王母和东王公作为有意识的视觉中心，再在两边配以向中心移动的神人异兽。”^② 这就意味着西壁山墙上的西王母图像并非是一幅孤立的图像，而是与东壁山墙上的东王公图像相互对应，形成了一种有意义的象征性结构。他认为山东武梁祠山墙上雕刻的西王母与东王公实为偶像型图例，是汉代宇宙观中阴阳对立统一思想的体现，这一点可从西王母与东王公图像所在的方位、侍从、灵禽异兽等图像因素看出。巫鸿指出，“很显然，武梁祠东、西两个山墙上的形象是根据汉代宇宙观的阴阳平衡理念而设计的，因此，西王母所在世界的特征就其所处的‘西’山墙的位置，以及陪衬西王母的神鸟和女侍从及西王母自身的身份所体现，西王母因此是阴性力量或女性原则的象征。与此相反的是，东王公的世界与阳性力量相关，这由东王公男性身份，他所在东边山墙上的位置，以及陪伴他的神兽来体现”^③。

就方法论层面的创新而言，巫鸿关于武梁祠西山墙西王母图像的阐释方法无疑是英语学界西王母图像阐释的创举。因为在他之前，从未有人将西王母图像置于具体图像情境与结构中加以阐释，不管其观点是否具有充分的信服力，

① 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69-70.

② 同①，133.

③ 同①，111.